

一个伪海龟老男人的幸福

——本报记者“专访”《非诚勿扰》主人公秦奋

本报记者 鲁超国

秦奋,电影《非诚勿扰》中的男主角,最近正火得厉害,找到采访说他接受记者采访,着实费了一把劲。

“人生是一种修行。有钱不一定幸福,有爱才是幸福。”在三亚临海的那个木房里,秦奋接受了本报记者关于“幸福”的专访。

秦奋是电影中虚构的人物,所以记者对他进行的专访,也是在《盗梦空间》里发生的故事,旁边桌子上的那个陀螺,一直转着停不下来,笑笑在旁边也一直幸福地看着秦奋笑……

▶本报记者在采访秦奋。(虚构照片)

秦奋简介

年龄:1961年出生
职业:开始是一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海归)”,但有车有房,现在接手朋友李香山的公司,向大款迈进。
家庭:49岁求婚,准备2030年结婚,届时70多岁。

“人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齐鲁晚报:秦奋先生您好,今天在影院屏幕上看到您和笑笑和好了,又开始了幸福生活,真心祝福你们。

秦奋:中国人就喜欢围观看热闹,不过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齐鲁晚报:我很纳闷,既然您把戒指都戴到笑笑手上了,为啥到2030年才结婚?

秦奋:我现在才拍到《非诚勿扰2》啊,导演想把我的故事每年都拍续集,那到了2030年不就拍到《非诚勿扰22》,不就成电视剧了吗。
齐鲁晚报:对于接手的公司,您有何长远打算?

秦奋:我要让员工有尊严地幸福生活,让公司充满公正,让员工对未来充满信心……绝对不会出现跳楼事件,如果真的有话,那也是他们自愿的。

齐鲁晚报:那您将来打算把企业交给谁?是香山的女儿川川还是您的子女?

秦奋:我不想制造“富二代”,打算裸捐。

齐鲁晚报:那您打算让您孩子从事什么职业?

秦奋:公务员。
齐鲁晚报:为什么?

秦奋:因为有人说中国是全世界养官员养得最好的国家。

齐鲁晚报:那您老了之后打算做什么?

秦奋:我想捡垃圾拯救地球,造福人类。

《非3》要去康巴什拍

齐鲁晚报:当年您在杭州留下钱想买房子,买了吗?

秦奋:当时犹豫了一下,后来想买的时候已经买不起了。

齐鲁晚报:但听说就是因为您在那里拍电影,所以才房价大涨,导致您自己买不起房。

秦奋:所以我跟冯小刚建议,《非诚勿扰3》便在“鬼城”康巴什拍,那里房价才便宜,需要我们。

齐鲁晚报:三亚临海的那个木房您真的租了20年吗?

秦奋:租期没到,那栋房子面朝

大海,却要被拆。

齐鲁晚报:那您打算上访吗?

秦奋:上访不如上网。

齐鲁晚报:您在网络的的确给力。
秦奋:不过有时候网络也是公厕,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大家有空来拉拉!

齐鲁晚报:这话听着耳熟,遇到这种事情您就这么冷静,没有暴力抗法,也没有自焚,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秦奋:换个角度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齐鲁晚报:啊?啥意思?

秦奋:你懂的。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齐鲁晚报:当您看着朋友香山得病之后生不如死,您心里是什么感受?

秦奋:在当时,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齐鲁晚报:香山先生的骨灰哪儿去了?

秦奋:按他的遗愿种花盆里了啊。那天陪他去选墓地,整个一大铺,活着扎人堆里,死了还是人挤人,他不乐意。

齐鲁晚报:为什么不给他买个大大的墓地?

秦奋:炒房已经厉害得很了,就不要炒墓了吧。

齐鲁晚报: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谈谈未来吧,将来您和笑笑结婚的时候打算邀请哪些朋友到场?

秦奋:李勤,他爸是李敖,不是李刚。

齐鲁晚报:您给我说说您是如何理解“幸福”二字的吧?

秦奋: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世界是简单的,复杂的是人,生活是轻松的,沉重的是感情。

齐鲁晚报:大家都觉得您和《让子弹飞》里的汤师爷及《赵氏孤儿》里的程婴长得特别像,性格和命运却各不相同,请问你们之间有啥关系?

秦奋:我是秦奋,这个问题你问葛优去。

齐鲁晚报:《非诚勿扰》(本文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



如果不出意外,多个省份将会把幸福指数写进“十二五”规划。

而一些城市已经提前几年就推行了“幸福指数”测量或者考核。河南平顶山市因为将“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而备受关注,江苏江阴因为三年来“幸福指数”频频上涨而遭遇“幸福的烦恼”。

可幸福适合被“指数”,能够被测量吗?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已经制定并实行“幸福指数”考核的城市的经验,寻找一条相对客观的幸福之路。

寻找煤城的“幸福”

文/片 本报记者 龚海

河南平顶山市将“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而且幸福指数连年增长,这条信息让备受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折磨的人们把目光投向这个中州煤城。

“幸福是人们的幸福,而幸福指数则是政府的幸福指数。”在平顶山采访时,有市民这样说。

不熟悉“幸福指数”

12月16日清晨,平顶山,零下5摄氏度,晴,冷。

“听说平顶山人活得很幸福?”当记者赶到平顶山这样发问时,许多市民觉得莫名其妙。

很少有人听说过政府已经运作了四五年的幸福指数考核。

在这个典型的工业移民城市,人们操着各式方言,对政府公布的幸福指数数据,他们会入乡随俗地说“不中!”
75岁的刘德民在这儿住了20来年,虽然不认同统计数据显示的平顶山城区大气环境优良天数超过300天,但刘德民还是觉得空气质量变好了,不再像几年前出门都不敢穿白衬衣,而尤为可喜的是,穿城而过的湛河水也清了不小。

但脏乱差还是有的,毕竟这儿是煤城。

“这里矿工得有一半儿吧。”市民老刘说楼上掉下一块砖头就可能砸到一个矿上的,在人口近百万的平顶山,矿工是最大的群体,而最大的煤炭企业在行政级别上甚至能与政府平起平坐,现任市长就是这家企业的原党委书记。

因煤而兴,平顶山与这家煤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老刘习惯称之为“平煤”,尽管这个平煤集团在重组当地另一家大型企业后已经更名为中平能化集团,它在平顶山举足轻重,涉足了煤炭、化工、房地产等领域,连马路上的井盖都有它铺的。

煤炭采空区,大量的矿工棚户区影响着城市的规划建设,市政府索性在距老城十余公里的西部,围绕着烟波浩渺的白龟山水库,平地起高楼,另造新城。
“那边空气要干净得多。”老刘

说,几乎所有的市直行政事业单位都搬了过去。不过普通市民还是宁愿呆在老城区,毕竟这里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而作为行政区、科教区的新城区配套设施还不很齐全。

是多少,都需要测度。而去测度,无非是去列举出到底做了哪些实事,比如“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学校。”
作为一种数据统计,他觉得统计局还没有办法去过问居民自己的感受,统计需要稳定的数据来源,而老百姓的幸福感都是很私人的,过于偏重情感因素,没法进行测度。比如居民个人的幸福观、道德观、婚姻观都影响对幸福的感受,但却没有具体的指标能用来测度这些感受,更没法反映这些感受。

“有人说这个幸福指数不好,那你给做出一个更好的来呀。”牛继庆觉得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过程,但一切都在慢慢改善”。

在确定各项指标时,平顶山统计局把收入放到了最前面。“因为它是民众幸福不幸福的基础,连收入都没有,谈何幸福?”牛继庆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才有可能幸福。”
这些年平顶山市民存款的增加,全民医保,农村低保的建立,高速公路的修建,对教育的大力投入,都被看做是对民生的改善,为平顶山的幸福指数加了分。

“我们体系是会改变的,当现在的某些指标被全覆盖后,我们就会考虑引入一些新的指标,从关注民生投入,慢慢去探索,最后总能找到指标后有什么意义,而该怎么生活还得怎么生活,幸福在这个城市或许只是一种精神追求。”

“要谈幸福,我肯定是平顶山最幸福的了,”出租车司机张建新就自告奋勇地说,“幸福就是要知足,有次客人把包落在我车上,里面有3000元现金,还背着一大包衣服在劳动路上搭架子卖。”

“一般人出去做个工,一个月就八九百、七八百块钱儿。”她4个孩子有两个到现在都没有工作,去矿上又觉得下井太危险,但普通人在平顶山除了挖煤还有什么别的好工作?

很少有人真的去关心政府的幸福指数报告,人们看不出这串数字背后有什么意义,而该怎么生活还得怎么生活,幸福在这个城市或许只是一种精神追求。

“要谈幸福,我肯定是平顶山最幸福的了,”出租车司机张建新就自告奋勇地说,“幸福就是要知足,有次客人把包落在我车上,里面有3000元现金,还背着一大包衣服在劳动路上搭架子卖。”

“平顶山式的幸福指数是客观的,可每个平顶山人的幸福是主观的,各有各的不同。”
“我们的体系是会改变的,当现在的某些指标被全覆盖后,我们就会考虑引入一些新的指标,从关注民生投入,慢慢去探索,最后总能找到指标后有什么意义,而该怎么生活还得怎么生活,幸福在这个城市或许只是一种精神追求。”

“要谈幸福,我肯定是平顶山最幸福的了,”出租车司机张建新就自告奋勇地说,“幸福就是要知足,有次客人把包落在我车上,里面有3000元现金,还背着一大包衣服在劳动路上搭架子卖。”

“平顶山式的幸福指数是客观的,可每个平顶山人的幸福是主观的,各有各的不同。”
“我们的体系是会改变的,当现在的某些指标被全覆盖后,我们就会考虑引入一些新的指标,从关注民生投入,慢慢去探索,最后总能找到指标后有什么意义,而该怎么生活还得怎么生活,幸福在这个城市或许只是一种精神追求。”

“要谈幸福,我肯定是平顶山最幸福的了,”出租车司机张建新就自告奋勇地说,“幸福就是要知足,有次客人把包落在我车上,里面有3000元现金,还背着一大包衣服在劳动路上搭架子卖。”

“幸福指数造假比GDP造假更可怕”

——对话幸福指数研究专家邢占军教授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幸福能够被“指数”吗?幸福指数能真的带给我们幸福吗?当幸福指数升高,老百姓会明显感受到幸福吗?本报记者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幸福指数研究组成员邢占军进行了对话。

“幸福”可以被测量

齐鲁晚报:您能否先介绍一下幸福指数的含义?

邢占军:最简单地讲,它就是一个量化指标,类似于GDP。GDP是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幸福指数则是生活质量的量化指标。

齐鲁晚报:GDP是一个客观数字,幸福指数也是客观的吗?

邢占军:对幸福指数内涵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从主观生活质量核心指标到生活质量核心指标的转变,作为主观生活质量核心指标,幸福指数考察的是人们的主观体验;而作为生活质

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是主客观的统一。

齐鲁晚报:很多人以自我的幸福感来对比幸福指数,认为它们无法对等,就像我们日常买菜感受到的菜价涨幅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无从一致一样。或者说,很多人根本就不认为幸福可以被测量。

邢占军:就主观体验而言,的确无法简单相加然后予以平均。但幸福指数不是单个个体感受的简单累加,幸福感只是幸福指数的数据来源之一。

指标体系还不完善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各地各级

政府幸福指数的重视?

邢占军:就这一现象本身而言,显然是一种进步。

齐鲁晚报: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和排名活动,但在这些研究和排名之中,始终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自行开展幸福指数或幸福感调查,这使得一些幸福指数调研结果一经发布就引起各界的广泛质疑。

邢占军:因为缺乏科学的指标体系和透明的调研程序,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举个例子,有些地方政府看上去是请来了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开展调研,所得数据就会客观吗?不见得。因为被评价地区的政府是资助方,这就很容易引起外界质疑。

齐鲁晚报:在您看来,如何才能保证幸福指数的准确与客观?

邢占军:因为我们目前所处的发

展阶段,第三方机构发展还不完善,只能是希望尽可能地排除干扰,同时在

指标体系研究上努力进行完善。

齐鲁晚报:您在最近完成的科研报告中,是否也提出了新的指标体系建设构想?

邢占军:是这样的,前面我提到,作为生活质量核心指标的幸福指数应该是主客观的统一。我前些年研究的就是“主观”幸福指数,在即将推出的报告中,我们重点建立了“客观”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在这一指标体系中,

邢占军:GDP是反映发展状况的指标数据,幸福指数则是“诊断性指标”,两者相辅相成;GDP是幸福指数的基础,幸福指数则反过来促进GDP的良性发展。

齐鲁晚报:目前已经有地方将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体系,这不见让人担心:当地方政府将“幸福指数”与政绩联系在一起时,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GDP”?

邢占军:GDP离大家还稍偏远一点,幸福指数则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如果造假,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强烈的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危害比GDP造假更可怕。

希望它不是GDP第二

齐鲁晚报:现在有些地方将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您怎么看?

邢占军:幸福指数的改善会受到宏观的长期的因素影响,而非一届政府、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如

果把它作为一项政绩,往往就会丧失科学性,进而丧失生命力。不宜将幸福指数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更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指标。

邢占军:是反映发展状况的指标数据,幸福指数则是“诊断性指标”,两者相辅相成;GDP是幸福指数的基础,幸福指数则反过来促进GDP的良性发展。

齐鲁晚报:目前已经有地方将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体系,这不见让人担心:当地方政府将“幸福指数”与政绩联系在一起时,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GDP”?

邢占军:GDP离大家还稍偏远一点,幸福指数则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如果造假,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强烈的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危害比GDP造假更可怕。

齐鲁晚报:现在有些地方将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您怎么看?

邢占军:幸福指数的改善会受到宏观的长期的因素影响,而非一届政府、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如

果把它作为一项政绩,往往就会丧失科学性,进而丧失生命力。不宜将幸福指数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更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指标。

邢占军:是反映发展状况的指标数据,幸福指数则是“诊断性指标”,两者相辅相成;GDP是幸福指数的基础,幸福指数则反过来促进GDP的良性发展。

齐鲁晚报:目前已经有地方将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体系,这不见让人担心:当地方政府将“幸福指数”与政绩联系在一起时,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GDP”?

邢占军:GDP离大家还稍偏远一点,幸福指数则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如果造假,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强烈的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危害比GDP造假更可怕。

齐鲁晚报:现在有些地方将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您怎么看?

邢占军:幸福指数的改善会受到宏观的长期的因素影响,而非一届政府、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如

果把它作为一项政绩,往往就会丧失科学性,进而丧失生命力。不宜将幸福指数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更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指标。

邢占军:是反映发展状况的指标数据,幸福指数则是“诊断性指标”,两者相辅相成;GDP是幸福指数的基础,幸福指数则反过来促进GDP的良性发展。

齐鲁晚报:目前已经有地方将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体系,这不见让人担心:当地方政府将“幸福指数”与政绩联系在一起时,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GDP”?

邢占军:GDP离大家还稍偏远一点,幸福指数则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如果造假,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强烈的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危害比GDP造假更可怕。

江阴“幸福的烦恼”

本报记者 石念军

2007年87.66分;2008年90.05分;2009年93.52分。

这是江苏省江阴市的“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数”。当更多地忙着把“幸福指数”写入“十二五”规划时,作为先行者的江阴市,正在遭遇“幸福的烦恼”——“幸福指数”居高不下,且持续增长。

最终,这一数据将被写入江阴市年度统计公报。

2007年,第一次发布这一指标数据,这一年,“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的得分为87.66。

第一年得分 87.66

2006年,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曾提出要让江阴百姓过上“五好”生活——“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

5年即将过去,以“五好”为核心的“幸福江阴”模式已然叫响。

实际上,“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远非“五好”这么简单。“‘处处都有好环境’为例,客观指标包含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绿化水平、环境质量指数等5项共8个指标,而主观指标则分别为民众对相应事项的满意度。”

“幸福江阴”逐渐被江阴视为执政思路。

在不同的“人”眼里,“幸福江阴”有不同的内涵。比如,对于政府部门负责人而言,“幸福江阴”即首要考核指标,如果完不成工作承诺,就会被“幸福江阴”督察委员会“约谈”。

出现在江阴市官方统计公报里的“幸福江阴”则是数据统计的一组类别,这一组数据所记录的,是一份“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成绩单。

它以百分制的评分方式对江阴市过去一年来的民生工作进行直观评价,这就是具有江阴特色的“幸福指数”。

依据“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客观指标占60%的权重,围绕“五好”设定有5大项39个子指标,由统计部门测算,按5年总目标实施年度评估;主观指标占40%的权重,以问卷调查形式

抽样测试民众对“五好”建设的满意度。

测算时,由江阴统计局组织的100多名调查员,对1200名样本户以登门造访的方式完成问卷调查,然后通过网络直报系统上传至江阴统计局。

“第一次看到那一组数据,我就感觉有点高。”在前来考察的兄弟县市的啧啧赞叹声中,陈华有着自己的困惑与担忧。他先是觉得这个数字有点高,进而怀疑:它准吗?

刚刚接触了国内最权威的一家调查机构,12月15日,与记者谈起“幸福江阴”推行三年多来的实践与感受,陈华并不讳言——“得分太高了。”此番接洽国内最权威的调查机构,正是拟请他们独立调研江阴“幸福指数”。

2008年,“幸福江阴”得分再次奏凯,陈华坐不住了。

“连续两年,江阴的幸福指数都很高,是不是我们的统计有问题?”陈华担心,是否因为他们的工作存在失误,所以江阴百姓“被幸福”了?况且,自测的数据总有难以服众的嫌疑。

陈华找到了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下称“中郡”),国内第一家专门以“县域经济和地州市州盟”等区域经济和特色经济为主要研究和对象的服务对象的独立性社会机构,2008年7月和今年7月,中郡先后两次立完成的调查数据显示,江阴百姓对幸福感的平均打分高出了解市统计局的自评分值。

它真的准吗?

有此疑惑的并不单单只有陈华,根据领导的授意,他开始接洽国内最权威的调查公司,只求打消内心的顾虑:百姓没有“被幸福”?